热点透析

相向而行的美古关系

□陈积敏

2014年12月1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劳尔·卡斯特罗分别发表讲话，宣布将就恢复两国外交关系展开磋商。当天，两国便采取了立即可见的改善关系的举措，向对方互释善意与诚意：古巴释放了已被监禁5年的美国承包商艾伦·格罗斯和一名被监禁近20年的美国间谍，美国则释放了已被关押15年的3名古巴间谍。此后，双方外交部门展开了密集的互动。近日，两国领导人在第七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期间再次握手，并进行了正式的双边会谈。从国际主要媒体如《华盛顿邮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路透社等新闻报道来看，它们均使用了“历史性会晤”这一用语，可见评价之高。

复杂的美古关系

回顾历史，美国与古巴的复杂关系清晰可见。由于地缘上的邻近，美国早在建国之初就意识到古巴的战略重要性，并表露出控制古巴的意愿。1805年11月，美国总统杰斐逊在给英国驻华盛顿公使的照会中宣称：“一旦同西班牙作战，基于战略上的考虑，（美国）就要夺取古巴。”1823年美国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在致西班牙国王的备忘录中又指出：“就像树上的果子被风吹下必然要落到地上一样，古巴一旦脱离西班牙……就不能自己生存，而必然并且只能倒向北美合众国……北美合众国绝不能拒而不纳。”这便是后来为世人所熟知的美国对古巴的“熟果”政策。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西班牙被击败，美国终于等到了摘取“熟果”的机会。1901年3月，美国又通过了“普拉特修正案”，实际上将古巴变成了它的保护国。

1959年，卡斯特罗兄弟等人推翻了美国支持的巴蒂斯塔政权，取得古巴革命胜利。然而，在冷战大背景下，古巴又成为美苏争霸的前沿之一。在两强对峙的格局中，古巴选择了站在苏联一边。1961年，美国宣布与古巴断绝外交关系。1962年，震惊世界的古巴导弹危机上演，令世界濒于核战争的自我毁灭边缘。显然，对于古巴卡斯特罗政权，美国必先除之而后快。然而，事与愿违。不论是美国策划、资助、指导下入侵古巴的“猪湾事件”，还是针对卡斯特罗本人的多次暗杀行为，抑或是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其最终结果都以失败告终。

随着冷战的终结，经济全球化大潮驱动着资本更快速、更全面的流动。但是，由于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制裁，使得美国企业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国外市场。与此同时，欧洲国家纷纷将资本投向古巴，并占据了巨大市场份额。在此情境下，美国不仅输了面子，也失了里子。近年来，大多数美洲国家对于美国政府在西半球的所作所为表现出厌恶与不满，其中之一便是美国对古巴的政策。例如，在2012年第6届美洲国家领导人峰会上，大多数美洲国家领导人都表示要邀请古巴参会，美国以种种理由阻挠而未能如愿。于是，在那次峰会之后，除美国和加拿大之外的32位与会国家首脑发表声明表示，将不再参加古巴缺席的峰会。这已经充分说明，多数美洲国家的独立性、自主性意识增强。显见，美国若不调整对古巴的政策，恐将在美洲地区失去民心，一种“正在失去拉美”的担忧也时刻萦绕在美国人心头。因而，在前往参加本年度美洲会议之前，奥巴马总统在牙买加金斯顿再次表示，美国对古巴的政策已经失效，是到了该重新认识并进行战略调整的时候了，“我们不应被历史禁锢。当一项实行了50年的政策不能奏效的时候就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你该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了”。同时，奥巴马总统还表示要进一步放下身段，重新构建与西半球国家的关系。他在本届峰会开幕之前的“公民社会论坛”上宣告，“美国随心所欲插手拉丁美洲事务的日子已然过去”。当然，美国与古巴改善关系也得到了美国民众的支持，尤其是拉美裔美国人的支持。据最近一份民意调查显示，59%的受访美国人，其中包括56%的拉美裔美国人支持两国改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寻求调整对古巴的政策有着坚实的民意基础。

奥巴马“巧实力”外交的范例

实际上，美国与古巴关系的改善反映了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战略的内核。很大程度上来说，奥巴马政府是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中将理想主义与务实作风结合得最为紧密的一届：一方面，奥巴马政府强调要捍卫与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又保持与对美不友好政权的对话与谈判，以便在具体事务上得以推进。这一点在奥巴马政府2010年5月所发布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这份战略报告中，奥巴马政府界定了美国四项持久国家利益，其中之一便是价值观利益，即要令美国及世界的普遍价值观得到尊重。但同时，奥巴马政府也明确强调要扩大外交接触的范围，保持与对美不友好或敌对政权对话窗口的开放。显然，奥巴马总统在对古巴的政策上也秉持并践行了这一理念。2015年1月，他在国情咨文中强调，“我们在古巴政策上的转变能够结束两国间的长期不信任，能够消除古巴限制的虚假借口，能够代表民主价值观，能够向古巴人民伸出友谊之手”。2月，奥巴马政府第二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再次强调了这一立场：“作为我们促进一个完全民主的西半球的一部分努力，我们将推进我们对古巴的新开放，最有效地促进古巴人民自由决定其未来的能力。”

不仅如此，美古关系的破冰还打上了奥巴马总统的个人烙印。对于一个即将任期届满的美国总统，这个时候考虑最多的问题就是要留下何种政治遗产，包括外交遗产。毫无疑问，美古关系正常化便给奥巴马总统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如果奥巴马总统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其历史地位将会得到很大的提升与确认。当然，奥巴马总统可能也会想起在2009年他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时国际舆论的质疑之声。他本人在获奖感言中也表示“非常意外也很谦逊地荣获这一殊荣”。不过，如果能够终结西半球的冷战局面，这或许会让他感到一丝安慰。因而，美古关系的改善与奥巴马总统的个人作用不无关联。为此，古巴领导人劳尔给予了奥巴马总统很高的评价。他表示：奥巴马总统是一个“诚实的人”“谦逊的人”，“我景仰他，他的行为大概与其平凡的出身有关”。此外，对于奥巴马个人而言，与古巴建立外交关系还有力地回击了美国共和党对他对外战略过于软弱的批评。在国际政治中，政策手段要服务于战略目标。美古关系的改善成为奥巴马政府“巧实力”外交化敌为友的一个典型案例。



“一个巴掌拍不响”。美古恢复外交关系的主动权固然掌握在美国手中，但古巴的意愿也十分重要。实际上，自劳尔·卡斯特罗政府成立以来，古巴国内也在着力于加强经济体制改革，这为美古关系的破冰提供了必要条件。与此同时，古巴国内舆论对于恢复与美国的外交关系也表现出积极欢迎的姿态，这为古巴调整对美政策提供了社会基础。《华盛顿邮报》近期对古巴人进行的一次联合民意调查结果显示，97%的古巴人认为与美国改善关系对古巴有好处，64%的人认为和美国改善关系可以让经济更好地发展。

美古关系正常化任重道远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冻也非一日之功。美国与古巴尽管能够重开使馆，互派大使，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但双方在诸多问题上仍然存在巨大分歧，这也将成为美古关系发展的重大挑战。奥巴马表示：“当我们在推进正常化进程之时，我们与古巴政府之间在诸多问题上仍将存在分歧。”劳尔也称：“我们愿意谈任何事情，但一切都需要耐心，而且要非常耐心。有些事我们可以达成共识，但有些不能。”可见，两国领导人对于横亘在两国关系发展上的障碍有着清醒的认知。此外，近半个世纪的敌对已经使得两国之间形成了较大的心理隔阂。打破两国外交关系的坚冰尚且如此不易，融化两国民众之间，尤其是古巴民众心中的坚冰则更是难上加难。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与古巴关系正常化还有一条漫长的路要走。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外交关系的恢复将成为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起点，这也表明了美古两国领导人打破历史禁锢，勇于开创未来的政治智慧与责任担当。单凭这一点，他们就应该被点赞。

◆名词解释

猪湾事件：又称吉隆滩事件，是一起由美国策划的、意图颠覆古巴新政权的失败的入侵事件。1961年4月17日，约1500名受过中央情报局训练的逃亡美国的古巴人在古巴西南海岸猪湾（又称吉隆滩），向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政府发动入侵。3天后入侵军被消灭，1000多人被俘，约90人阵亡。猪湾事件标志着美国反古巴行动的第一个高峰。对美国来说这次未成功的进攻不但是一次军事上的失败，也是一次政治上的失误。国内外对这次进攻的批评非常强烈，刚刚上任90天的约翰·肯尼迪政府为此大失信誉；相反，卡斯特罗政权和古巴革命得到巩固。由于古巴担心美国再次进攻，因此古巴开始与苏联靠近，最终导致了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

（上接第1版）

记者：我觉得，近年来我国在政治、经济上的成就可以用“举世瞩目”来形容。说到安全和文化问题，这也是习近平主席一再强调的，并且我国已经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积累了良好的基础。

王毅：可以这么说。安全上，我们要营造各国共享安全的新局面。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和平来之不易，维护和平尚需努力。我们应更积极运作好联合国宪章确立的止战维和安全保障机制，更有效发挥好联合国及安理会的作用，提升预防冲突能力。我们要进一步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综合安全和可持续安全的观念，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走出一条各国共建、共享、共赢的安全之路。

中国积极参与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动，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已经派出近3万人次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不久前派遣的一支700人步兵营已经抵达南苏丹参与维和行动。我们以负责任态度在亚丁湾和索马里海域开展护航，迄今已派出19批护航编队为5800多艘国际船舶保驾护航。

中国积极致力于维护地区稳定，推动打造地区安全对话合作平台。我们成功召开亚信峰会，并愿以上海合作组织和东亚合作框架为支撑，开展双多边防务安全交流合作。我们坚持通过和平方式处理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已经同14个邻国中的12个国家彻底解决了陆地边界问题。我们积极倡导处理南海问题“双轨”思路，即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寻求和平解决，南海的和平稳定由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得到地区多数国家理解支持。我们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维护网络安全、抗击传染疾病等国际合作，在国际安全事务中发挥着负责任大国作用。

中国还在积极参与各种热点问题的斡旋调停，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可行之道。我们倡导并践行解决热点问题三原则，即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反对强加于人；坚持客观公道，反对谋取私利；坚持政治解决，反对使用武力。我们坚定致力于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和无核化进程，成功主办阿富汗问题伊斯坦布尔进程第四次外长会，深度参与解决伊朗核问题谈判，围绕中东一系列热点问题开展特使穿梭外交，倡导举办了“支持伊加特南苏丹和平进程专门磋商”。我们运用自身的资源和优势，推动斡旋缅甸国内的民族和解进程，既有利于缅甸自身的长治久安，也有助于中缅边境地区的和平稳定。

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坚持尊重乌克兰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乌克兰的内部事务，主张乌克兰问题应以和平方式政治解决。我们认为，乌克兰危机的最终出路在于维护好两个平衡，即把握乌国内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利益诉求的平衡，把握同俄、欧两大邻居关系的平衡，使乌克兰成为东西方沟通的桥梁，而不是对抗的前哨。

文化上，我们要形成不同文明包容互鉴的新气象。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和众多宗教，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明，每一种文明都是人类共同的宝藏。中华民族向来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千百年来，儒家文化与道教、佛教以及伊斯兰教等不同文化和宗教，在中国大地上各得其所，和谐相处。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有力地证明，不同文化、不同宗教完全可以做到“并育而不相害”，关键是要平等相待而不是居高临下，相互欣赏而不是相互贬损，彼此包容而不是相互排斥。

认识和驾驭“互联网+”大潮

——中央党校举办“互联网+：信息经济浪潮与机遇”高峰论坛

□本报记者 程冠军

4月的中央党校，春意盎然。

4月11日，一场别开生面的互联网盛会——“互联网+：信息经济浪潮与机遇”高峰论坛在中央党校育园楼举行。坐落在中央党校中轴线上的这座灰白相间的小楼，是省部级领导干部上课的地方。在这里举办“互联网+”的盛会，更具有特殊的意义。

这个为期一天的论坛是由中央党校报刊社、中央党校信息中心、信息社会50人论坛共同主办的。参加论坛的200余名嘉宾当中既有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信息中心、国家相关部委的领导和专家，也有信息社会50人论坛的成员和企业家代表。此外，中央党校的多名学员代表也参加了本次论坛并作了精彩的演讲。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总经理吴燕生，中央党校校委委员、培训部主任罗宗毅，中央党校校委委员、组织部长黄宪起等出席了论坛。

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出席论坛并作了讲话。他说，把握潮流才能赢得未来。当今世界，信息技术革命日新月异，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相互促进，互联网已经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刻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以及治理方式。信息流引领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促进各个方面资源加速流动或者整合，信息资源日益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信息开发及其利用率成为国家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信息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新的特征甚至一种新的经济形式，它正在推动行业性、地区性、世界性的经济重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高度重视生产力创新带来的社会变革，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经济社会的大变革，我们不但应该主动适应它，而且必须要勇于站在这个潮流之上，去主动驾驭它，让它为更好地实现中国梦提供新的动力和支撑。

何毅亭强调，新希望在于开拓新的战略空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去年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保持经济平稳增长，要“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尤其要重视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在信息化道路等方面找出路，寻亮点。今年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要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在中央高度重视下，中国的信息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一定会获得大发展。

何毅亭说，中央党校报刊社等单位在这里举行“互联网+：信息经济浪潮与机遇”高峰论坛，抓住了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新的主题。他表示，中央党校承担着为党培训中高级领导干部以及理论科研、思想引领、智库咨询等重大职能，开展这些工作不但需要不断发展的信息化支撑，更需要关注和探索信息化潮流中的大数据、“互联网+”等新的理念与实践问题。这样的论坛助推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现代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等的相互融合、协同创新、健康发展，正当其时，意义重大。

中央党校多位学员在论坛上发言，表现出对“互联网+”与信息经济的极大兴趣与关注。他们认为，在新的浪潮之下，一定要转变思维方式，积极应对，走在信息经济的前列。

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员、江西省副省长朱虹在讲话中介绍了江西省决定实施以“互联网+”为核心内容的三大措施；中青年干部培训一班学员、甘肃陇南市委书记孙雪涛向大家介绍了本来名不见经传的陇南靠互联网和二维码实现了经济发展的弯道超车的做法；中青年干部培训二班学员、广东汕头市市长郑人豪在发言中说，汕头市的信息消费总收入去年超过了250个亿，电子商务总额达500个亿，已连续3年每年递增50%；进修班学员、工信部电子信息产品司副司长安筱鹏说，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发展的优势很大，但是在智能制造方面，我们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对于学员们的发言，与会者用“精彩”来形容，他们提到的新理念、新做法，使会场的氛围出现高潮，大家掌声、笑声、赞叹声此起彼伏，也感受到领导干部对“互联网+”的敏感和重视。

专家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互联网+”与信息经济浪潮的特征和影响，向与会者提供了新视角、新理念、新方法，引起了与会者的很大兴趣。多位知名企业家登上讲坛，就企业在新机遇面前的新选择以及对政府部门的建议发表了演讲，许多观点都引人深思。

阿里巴巴总裁金建杭在演讲中说，“‘互联网+’可以加很多东西，但唯独不能加传统思维方式和既得利益”，他还提出了一个“3+2”的政策建议；北京邮电大学校长助理吕廷杰认为，互联网将会彻底颠覆传统银行金融的运作模式，并且指出关键是要让互联网拥抱实体经济；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认为，“互联网+”的新经济浪潮不但需要技术创新，而且需要一场思想解放和体制变革；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当前政府要着重为互联网与各个方面的结合做好引导与服务；中央党校报刊社总编辑钟国兴提出，面对“互联网+”的新经济浪潮和机遇，我们不能只顾加法，忘了减法，这个减法就是要减去落后的思维方式、政府对市场的过多干预以及简单的社会管控方式等许多方面的东西。

除主题演讲外，还举办了圆桌论坛。在圆桌论坛上，信息社会50人论坛专家梁春晓、杨培芳、胡延平、吕本富、师曾志，中央党校教授杨秋宝、王克迪等20多位学者，就“互联网+”话题各抒己见，还就有的观点进行了激烈的交锋。这些观点交锋一直吸引着与会者，以至于会议中途基本无人退场，直到会议结束，仍有许多人意犹未尽，抱怨“一天会议时间太短了”。

钟国兴致开幕辞并作了会议总结。他特别介绍了信息社会50人论坛。“信息社会50人论坛”成立于2011年9月，是由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工信部电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和阿里研究院等五家单位共同发起。论坛聚集了国内致力于中国信息社会问题研究的一批著名学者及领域内专家，以“开放分享、相互学习、平等争鸣、文责自负”为原则，共同探讨中国信息社会发展问题，为中国信息社会的发展提出建议。钟国兴说，这次论坛能够在中央党校举办并受到党校学员的高度关注，意义深远。这说明领导干部们正以开放和积极主动的心态热情拥抱“互联网+”和信息经济潮流。

中央党校信息中心主任王金龙、国家信息中心研究部主任张新红分别主持了上午和下午的论坛。

本次论坛得到了多家媒体的关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新华网、中国经济网、中国网信网、光明网、凤凰网、中青网、央视网、中新网、国际在线、中国日报网、宣讲家等媒体对论坛以各种形式进行了报道，并以微博微信客户端等形式发布论坛热点信息。广大网友纷纷对中央党校率先举办“互联网+”论坛点赞加油。

（本次论坛发言摘要详见第10、11版）

会议综述